读史札记

# “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冯天瑜

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
交语汉鞑与英法，欲舍我短学彼长。
——高杉晋作：《无题》

## 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中国明朝（1368—1644）与日本室町幕府（1338—1573）间保持着相当兴旺的勘合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国商船从江浙启航，10天内可抵达长崎等港，甚至“顺风不三日可至日本”①；日本每年也派出遣明船多艘。日方出口铜、硫黄、刀剑、扇子、漆器等，中方出口制钱、生丝、药材、书画、陶瓷器等。这种双边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一斤唐丝（中国生丝）在日本以20倍价格出售，日本一把值八百文的刀剑，在中国可卖出6倍以上价钱。②这自然刺激双方商船的穿梭航行。在贸易之外，日本还多次派出遣明使，著名者如了庵桂悟（1425—1514），以83岁高龄任遣明正使，1514年（永正十年）归日时已经89岁，中国学者王阳明（1472—1529）曾作《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送序》相赠，赞其“年愈上寿，不倦为学，领彼国王之命，来贡珍于大明”③。

经战国纷乱后，丰臣秀吉（1536—1598）统一日本，1592年（元禄元年）开始实行朱印船（又称朱章船）制度，即由幕府颁发特别证件“朱印状”——盖有幕府红印的航海证明书，船主（多为九州大名和大阪、长崎豪商）持此状可航行中国及南洋。德川家康（1542—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后，将朱印船贸易进一步规范化，奖励京都、堺、长崎商人领取朱印状，力图恢复因倭寇袭扰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中断的对明贸易。从1604年到1635年重申禁止渡航海外以前的30年间，日本派出的朱印船达365只之多，其贸易额超过荷兰及中国商船的对日贸易额。家康死后，二代将军秀忠（1605—1623执政）以降，渐次推行禁教、锁国政策，1633年至1639年（宽永十年至十六年）幕府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锁国令”并非17世纪的原始称号，而是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后对江户前中期外交政令给定的名称。这里遵循近代以来的习惯，称江户初期严限对外交往的政令为“锁国令”），确立“锁国体制”，曾繁盛一时的朱印船贸易被完全禁止。

日本在宽永年间开始实行的锁国政策，一

[收稿日期] 2000—04—02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男，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430072；现任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

方面限制外国人来日通商，另一方面禁绝日本人出海贸易，1633 年（宽永十年）幕府下令，日本人“外国渡航死罪”，1635 年（宽永十二年），重申严禁日本人海外渡航，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归国处死刑。这两方面相比较，对日本人出海贸易的禁止更为严厉，使得日本这个有着远航传统的海洋民族[4]，在 17—19 世纪间被禁锢在日本列岛内整整 220 年。

由于中国同荷兰、朝鲜是被特许来日贸易的三个国家，在日本锁国的两个多世纪间，中国商船仍联翩而至，长崎十善寺地区还建起中国人的街道——“唐人屋敷”，清初“华商之来日本者日众，有船一百八十四艘”[5]，以后日本虽屡次限制，但每年仍有几十艘中国船驶抵长崎。李鸿章（1823—1901）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在直隶总督任上论及中日建立正式贸易关系时，追述中日贸易的历史状况说：

> 顺治迄嘉道年间(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中叶——引者)，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6]

与中国船商不断赴日相对照，日本人则完全没有前往中国的机会，出现一种只有中国人来、没有日本人往的不平衡的日中交通状况。诚如大庭脩所说：

> 江户时代最森严的锁国政策是禁止日本人出海航行，这样就使得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在整个日中关系史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即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物产，完全通过中国人传入日本，与以前日本人去中国学习文化、带回物产的交流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7]

江户时期两个多世纪间畸形的日中交流关系，随着日本被迫于 19 世纪中叶开国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开端便是 1862 年（文久二年）幕府官船“千岁丸”的上海行，从此，日本的对中国贸易，由被动接受的“居贸易”，转变为主动前往的“出贸易”，或称“派遣贸易”。日本人在中断两个世纪后，重新踏上中国土地，耳闻目睹、亲历身受了晚清的中国社会。

## 二、幕末打开对清交通的努力·“千岁丸”的选购

19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日本被迫开国，相继同美、英、俄、荷、法等欧美国家签订通商条约，但同近邻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主要的贸易对象国却没有正式条约关系，日中间的贸易权益，不少被居间的西洋商人所获取。荷兰、英国商人往往从中转日中贸易牟得数十倍暴利。因此，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幕府及诸藩，从与西洋外交相抗衡考虑，也从直接获取日中贸易权益着想，认为必须直接对清交通，争取与清朝建立正式商贸关系。

1858 年 9 月（安政五年八月），《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老中阿部正弘的亲信、目付[8]岩濑忠震（1818—1861）派遣属下前往香港，作有关贸易和关税征收法提案调查，并考察胁荷商法（私人交易）的新贸易方法。

1859 年 3 月（安政六年二月），箱馆奉行堀织部正、村垣淡路守、竹内下野守、津田近江守四人联署，提出向外国派遣使团的申请书，目标一是黑龙江河口，二是上海与香港。这一建议引起幕府的关注。

1861 年（文久元年）1 月，箱馆奉行村垣淡路守、津田近江守再度联合提出同样内容的申请书，并建议租用外国船作贸易官船，为此聘请在箱馆（今北海道函馆）的俄国领事馆的船员，商讨租船事宜，拟于当年夏天启航。与此同时，幕府勘定所和外国局又同英国公使商讨，得到租船及接待造访沪、港的承诺。因上海、香港之行的准备工作未完成，1861 年 5 月至 9 月，由舰长武田斐三郎率官船“龟田丸”先期赴黑龙江河口，考察俄国远东各州，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作试探性贸易。[9]

1861 年 5 月（文久元年四月），幕臣小栗忠顺（1827—1868）、冈部长常上书，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长崎奉行冈部长常（1857 年至 1861 年在任）建议，关于贸易方法，可到长崎出岛荷兰商馆打听；又鉴于“长毛贼”（太平军）包围上海，上海商业景气恶化，因此，出使官船的第一位任务是调查情况，第二位任务才是商品买卖。等到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商讨日清贸易协议的缔结问题。冈部还建议，租用荷兰船，使团也不悬挂日章旗。[10]关于向清国派遣贸易官船，外国奉行中慎重行事的意见占上风，后因主政的老中安藤信睦（1819—1871）、久世广周等的推动，

冈部的建策得以采纳，遂发布命令，选考派遣官员，并准备租用外国船只，还有派军舰，或派君泽型船只等方案。

为试探租用外国船只，幕府曾派员同停泊长崎的西洋船只接触。长崎会所商人松田屋伴吉（1831—1880）在所撰《唐国渡海日记》1862年4月2日（文久二年三月四日）写道，当天在茶屋吃早茶时得见阿兰小通词（荷兰语翻译）岩濑弥七郎，岩濑为租船事来此，与长崎会所的森寅之助、永井屋喜代助、铁屋利助等，在长崎港内看中了两艘荷兰船，经与荷兰人接触，获悉租金要价颇高："270吨的二桅小舟，一月租赁金为洋银一千三百枚；又一艘600吨大舟，一月租赁金为洋银三千枚。"[11]幕府遂改变主意，决定购买洋船。其时停泊在长崎港内的英国船"亚·米斯特斯号"成为选购对象。

综合胜海舟《海军历史》卷23《船谱》所载和《奴－斯·卡伊那·海拉尔德报》1862年6月14日采访报道，"亚·米斯特斯号"(Armistice)，是一艘"巴·库"型三桅帆船，1855年在英国山大兰岛建造，船重256吨，登录重358吨；可以装载相当于登录吨位二倍重的货物。据日本人记载，此船"长20步，宽3步半"[12]，一说此船"长二十间，宽四间四尺，深二间五尺"[13]（一间为6尺，或1.82米）。原主林次亚鲁得松。"亚·米斯特斯号"曾作为英国商船航行于东亚海域，1860年10月起，往返于上海——长崎之间，商业效益显著。1862年4月10日（文久二年三月十二日），幕府派员付御组头中山诚一郎、沼间平六郎等，与通词岩濑弥七郎、森寅之助，以日本政府名义与英方商讨购船事宜，结果以"洋银三万四千枚"（34,000美元，相当于日本银币三万两）成交。[14]日方购船事宜的主持人是继冈部长常任长崎奉行的高桥美作守（1861年6月至1862年9月在任），高桥取"可以使用千年的船"之意，将此船更名"千岁丸"[15]，并将日章旗挂起。

## 三、"千岁丸"的使命

幕府以重金购买英舶，作为贸易官船出使上海，其直接任务自然是开展对清商贸。乘"千岁丸"赴上海的浜松藩士名仓予何人所撰《海外日录》称：

> 此举意在恢复宽永以前之朱印船贸易，然受官吏之台命而入唐，乃室町幕府以来稀有之事，故参与此行者皆有奇异之思，岂非一大快事。[16]

长州藩士高杉晋作所撰《航海日录》说：

> 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17]

此行以恢复宽永以前繁盛的对华贸易为目的，但幕吏们疏于外贸，必须依赖洋人作中介。而且，诚如冈部长常前此指出的：具体的货品交易尚在其次，借此作广泛的商事及社情调查更为要紧。

这是因为：

其一，上海是西洋人在远东最重要的商业、交通、军事据点，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来，经过20年，这里已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近代海港城市。19世纪50年代英国驻沪领事便说："近几年来，上海作为根据1843年条约实行五口通商的主要商埠，在贸易上所发生的变革和惊人发展，差不多是任何远离现场的人所无法领悟的。在拓殖和贸易史的编年史上，从未看到有比这更加惊人的情况。"[18]已被欧美列强打开门户的日本，一方面派员远赴欧美以求师法（如万延使团等），另一方面把上海视作西方各国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当然希望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这一意图，在幕臣小栗忠顺、冈部长常1861年5月的上书中表露得十分清楚。就近观摩西洋文明，也是一批思想活跃的藩士踊跃争取参加此行的原动力。

其二，自1850年以降，已经进行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与清朝间的战争，一直被日本幕府和民间所关注。此前，1837年（天保八年）日本曾发生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城市贫民暴动，给幕府统治造成巨大震撼。日本民间把太平天国与大盐暴动联系起来，甚至有洪秀全是大盐平八郎的义子格之助转世的传说，足见日本人并没有把太平天国看作与己

无关的海外故事。幕府此际遣使到清朝与太平军作战前线的上海，当然有实地观察太平战事的意图在，而参加此行的长州、萨摩、浜松诸藩武士，更对此抱强烈兴趣。

其三，“千岁丸”上海行，作为一次官派商贸举措，具体考察日清贸易诸细节，以及清朝与西洋人商贸关系诸问题，当然是更切实的目的。使团成员及随行的藩士和长崎会所商人为此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使团随行的长崎会所唐通事（汉语翻译）蔡善太郎回国后所撰报告书，列出在上海调查的26个题目——

（1）中国的金银铜货币的种类；

（2）其通用交易场所和兑换比率；

（3）鸦片及烟草输入量；

（4）耶稣教取缔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

（5）西洋人雇用中国人到外国工作，中国政府如何处置；

（6）西洋人墓地买卖及借贷关系；

（7）西洋人纳中国女性为妾及所生子女，中国政府如何处置对待：

（8）从上海到出海口的江水深浅标数；

（9）西洋人在上海近郊狩猎，政府如何处置，是否取缔；

（10）中国商人输入日本产的铜，需向政府支付的金额；

（11）公用的驿站所能提供的人马数量；

（12）国内的主要港口名称；

（13）西洋军队担负国内警备，中国政府是否依赖于此；

（14）运输所的银价与市中交易银价有差异的理由；

（15）官秤与市中通用秤有差异的理由；

（16）道台与各国领事之间交换文书的格式；

（17）上海城内的户数和人口数；

（18）是否向条约缔结国派遣使臣；

（19）没有签订条约国家的人为了商务进入中国，对此中国有何具体规定；

（20）关于在西洋人的租界里居住，有无规定；

（21）对外国人租赁土地、卖土地有无规定；

（22）除日本、朝鲜、琉球、香港以外，中国船是否还有发送地；

（23）朝鲜、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

（24）西洋炮术的传习状况；

（25）中国妇人从事的产业；

（26）道台与西洋各国领事的交涉场所及翻译关系。⑲

这些调查题目，有些是日本与中国开展贸易交往必须弄清的具体细节（如1、2、3、8、10、11、14、15等项），有些（如5、6、7、9、20、21等项）是日本接纳西洋人入境后，同样会遇见的，有些则广泛涉及清朝军政社情和上海概况。总之，日本企图从上海直接了解清朝实态，并从这个远东较早国际化的城市，学习国际外交惯例，掌握国际贸易及与西洋人打交道的通则。而先期开埠的上海，确实可以给开国初期的日本以借鉴。以上述第6条为例，上海的西方侨民1844年召开第一次公众会议，组成“公墓管理委员会”，购置“老坟山”作西洋人墓地。⑳其操作办法正可供日本参考。至于从上海所透现的清朝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态，所展示的西洋文明的诸多侧面，均给日本造访者以丰赡的见闻。

## 四、“千岁丸”乘员及其上海纪行文

“千岁丸”上海行，是日本开国后的幕府第一次向清朝派出使节团和第一次开展官商性“出贸易”。因“千岁丸”刚从英国人手里购置，驾驶等事宜尚由英国人掌握，船长是英国人亨利·理查多松（Henry Richardson），其夫人同行。有日本学者认为，此理查多松可能即1862年9月“生麦事件”㉑中被日本武士刺杀的理查多松（1827—1862），但尚无确证。另有一等航海士一名、二等航海士一名、木工一名、厨师一名、賄方（卖方代表）一名、水手六名、仆役三名，㉒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图莫卜林古以货主名义雇来参加此行，因日本当时与清朝尚未建立正式商贸关系，“千岁丸”所携货物需以荷兰商品名义方能进入上海。㉓这样，“千岁丸”乘员共有英国人15名、荷兰人1名，此外便是51名日本人，包括由幕府官吏（简称“幕吏”）组成的使团正式成员，由

各藩武士（简称“藩士”）担任的幕吏随从，还有翻译、医生、长崎商人及其从仆、炊夫、水手。“千岁丸”日本、西洋乘员共计67名。

“千岁丸”上51位日本人，其名单及身份，依据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高杉晋作《航海日录》、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所载，综合整理如下：

| | | |
|---|---|---|
| 御勘定[24]　根立助七郎 | 从臣 | 林三郎（会津藩士）<br>纳富介次郎（佐贺藩士） |
| 调役并[25]　沼间平六郎 | 从臣 | 深川长右卫门（佐贺藩足轻）<br>松本卯兵卫（熊本藩士） |
| 支配勘定[26]金子兵吉 | 从臣 | 日比野掬次（辉宽尾张高须藩士）<br>伊藤军八（大阪书生） |
| 御徒士目付[27]　锅田三郎右卫门 | 从臣 | 木村传之助（江户人）<br>名仓予何人（浜松藩士） |
| 长崎会所挂调役（员外）　中山右门太 | 从臣 | 山崎卯兵卫（佐贺藩足轻）<br>樱木源藏（阿波藩士） |
| 御小人目付[28]　盐泽彦次郎 | 从臣 | 中牟田仓之助（佐贺藩士） |
| 御小人目付　犬塚�三郎 | 从臣 | 高杉晋作（长州藩士） |
| 长崎会所定役　中村良平 | 从臣 | 芳藏（平户人） |
| 御雇医师　尾本公同 | 从仆 | 峰源藏（洁　大村藩士） |
| 长崎会所吟味并投　森寅之助 | 从仆 | 长藏 |
| 唐小通词　周恒十郎 | 从仆 | 藤太郎 |
| 唐小通词并　蔡善太郎 | 从仆 | 福松 |
| 阿兰小通词并　岩濑弥四郎 | 从仆 | 硕太郎（大村藩人） |
| 药种目付头取　渡边与八郎 | 从仆 | 传次郎（岛原人） |
| 笔者格（长崎会所派出）　杉田兵次郎 | 从仆 | 卯市 |
| 长崎商人　永井屋喜代助 | 从仆 | 惣吉（江户人） |
| 长崎商人　松田屋伴吉 | 从仆 | 甚三郎 |
| 长崎商人　铁屋利助 | 从仆 | 忠助佐吉 |
| 炊夫　佐吉　清助　善吉　嘉市　兵吉　吉藏 | | |
| 水夫　五代才助（萨摩藩士）　忠次郎萨摩藩人）　纹藏　元右卫门 | | |

以上日本乘员，有生平事迹资料可寻的，兹简介如次。

调役并沼间平六郎，是使节团事务的实际总管，相当于“千岁丸”的日方船长。沼间平六郎的从臣深川长右卫门，肥州藩人，任佐贺藩足轻（步卒）。作为下层武士，他参加上海行，是为了在上海寻找日本物产的市场，并调查中国物产运往日本贩卖的可能性。[29]深川后来与藩士佐野常民（1822—1902，日本红十字事业创始人）于1867年（庆应三年）一起赴法国，参加万国博览会。

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的从臣纳富介次郎（1844—1918），佐贺藩士，纳富六右卫门的养子，号介堂，少年时随父亲学习邦画（日本画），1860年（万延元年）在长崎学习南画。他应募参加“千岁丸”上海行，任务是“绘画清国事情”，高杉晋作称纳富参加此行是“画工之由也”[30]。但到上海纳富即病倒，留下画作不多，仅存三幅，一为英军帐蓬图，二为扛枪挂刀的乡勇，三为金锭、银锭、铜钱等清朝

通货图。纳富称："我感到遗憾的是偶然踏上唐土，本应游历名山大川和城市，目睹各种事情，进行实地速写，以图文记录，有助于探察，为官方做一点有用之事。可是，船刚到岸不久就病倒在床，良久难起。起来后又很难恢复外出。不过，幸运的是，上海是边境，离贼远，所以从各地来避难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是书生，他们听说皇邦与诸洋人不同，崇圣教，文字明晰，有不少人乐于来访，诗话笔语，交流感情，我从中了解了不少事情。"[31]纳富据此写出纪行文《上海杂记》（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卷），行文朴实，注重细节，于"千岁丸"上海行记述颇详。1869年（明治二年），纳富再次渡航上海。1871年（明治四年）在横滨学习油画。1878年（明治十年）任第一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审查官。以后在江户川制陶所任制陶家，并从事实业教育。

支配勘定金子兵吉的从臣日比野掬治（1838—1912），号允成，讳辉宽，尾张高须藩士。他笔耕甚勤，用日文撰纪行文《赘肬录》，详记上海军政事件、社会风俗；又用汉文撰写与中国人的笔谈录《没鼻笔语》（二篇均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卷），颇富史料价值。日比野善汉诗，其《赘肬录》收入上海纪游汉诗十余首。幕末曾在尾州藩为攘夷奔走，明治初年任大藏省官员，后辞官为风雅之道。金子兵吉的另一从臣伊藤军八，浪速处士（大坂书生），富于文才，曾与高杉晋作在昌平塾同学，两人在"千岁丸"相逢，谓之"奇遇"。此行两人常结伴访问。[32]

御徒士目付锅田三郎右卫门的从臣名仓予何人（？—1901），名信敦，字先之，号松窗，通称重次郎，浜松藩士，井内河内臣的家臣、兵学者，曾任浜松藩儒官，又习洋学。此行撰《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二篇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其中关于淮军状况的记述颇详，并对清朝咸同之际军事水平的评论有相当见地。名仓还注意于上海与江户、大阪比较，上海与华盛顿、纽约比较，显示出较宽阔的视野，1867年（庆应三年）幕末第四次赴上海使团，由浜松藩和佐仓藩联合组成，率团者即为时任浜松藩主井上河内臣的家臣的名仓予何人。明治维新后，历任开拓大主典、外务大录、外务大佑，晚年任根岸汉学塾主。除上述两次上海行之外，名仓还曾到中国大陆及台湾踏访三次，对中国友人及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

御小人目付盐泽彦次郎，是"千岁丸"赴上海使团中惟一先前曾经出国者，1860年2月至10月（万延元年一月至九月），他作为新见正兴率领的使团成员，乘美舰"波哈丹号"访美。"千岁丸"乘员访问上海时，所作上海与纽约、华盛顿的比较，涉及到的美国情况均系盐泽彦次郎在船上交谈时提供。[33]盐泽彦次郎的从臣中牟田仓之助（1837—1916），佐贺藩士金丸孙七郎的次子，后继嗣中牟田家，曾在蒙养馆、弘道馆、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晓军事及洋学，高杉晋作称中牟田"航海术有心得，且略通英语"[34]。上海渡航，中牟田撰《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等（收入《子爵中牟田仓之助传》）。从上海返回后，任海军调查长副官、船长副官。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参加1868年（明治元年）的戊辰战争，授海军中佐、少将、中将，历任横须贺镇守府长官、海军机关学校长、枢密顾问官，封子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任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后军令部长职被激烈主战论者桦山资纪中将所取代。

随行医生尾本公同，丰桥人，时任大村藩医，是有影响的兰医（荷兰医学医生），著有《在村的兰医》。他的从仆峰源藏，大村藩士，通称源助，又叫峰洁，是食禄24石的下级武士，晓兰学、天文学和测量学，所撰《航海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图文并茂，资料价值较高。两篇纪行文中还间有用汉文记录的与中国人的笔谈。从上海回日本后，峰洁由吟味役助晋升的吟味役（审讯官）。

参加"千岁丸"上海行的长崎会所商人共三名，原定有春日屋文助，因病，以永井屋喜代助取代[35]。三商人均以商家或商店（××屋）为姓，其中之一的松田屋伴吉（1831－1880），撰《唐国渡海日记》（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详记此行的商事活动，从长崎购船、采办货物、货物在长崎装

船，到与清方商人在上海交易，均逐日记述，并具体详列从长崎运往上海的日本商品的名目、数量、价格，以及从上海购买的中国商品的名目、数量、价格，双方交易过程，提供了当年日中贸易及彼此商事习惯的翔实材料，可供日中近代经济史研究参考。

幕末日本人出访域外，多留下纪行文字，如1860—1868年间访问欧美的幕吏、藩士有多种纪行文流传于世，如玉虫左太夫的《航美日录》、柴田刚中的《日载——英法行》、福田作太郎的《英国探索》等。[36] 1862年造访上海的“千岁丸”乘员，也有多种见闻录传世。综观此行51位日本人，居上位的8名幕吏，远不及作为随从的10余名藩士思想活跃、行动积极。现存的上海见闻录中，除载幕吏们拜会上海道台及英、法、荷领事外，极少关于幕吏言行记述。而且令人讶异的是，幕吏们全都没有留下纪行文字。现在所能得见的“千岁丸”乘员文久二年上海行纪文共17篇，其中16篇出自藩士之手，一篇由商人所撰。它们是——

佐贺藩士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

尾张高须藩士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没鼻笔语》

（以上三篇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卷）

大村藩士峰洁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

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

浜淞藩士名仓予何人的《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

（以上五篇收入《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

长州藩士高杉晋作的《航海日录》（正续）、《上海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崎阳杂录》，合称《游清五录》。

（收入《高杉晋作全集》下卷）

佐贺藩士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长崎出发上海迄航海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公仪御役唐国上海表道台及之外应接书》

（中村孝也《子爵中牟田仓之助传》引述）

藩士及商人撰写见闻录，意在纪实，以供邦人了解外域社会，因而没有用力于描绘山水名胜、记载风雅之言。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序》对自己纪行文字写作的交代颇有代表性：

> 此书，或以汉字，或以国字，随便取笔，务记实事，不敢用意于文字，唯要，使真知己知幕府支那行之始末，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不欲博示诸友人也……区区杂录记所闻见耳，他到写山水之景，吐风雅之言，予所不敢好，乃托诗文诗家先生而已。

这样的纪实文字自然有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纳富介次郎对于使节团诸人撰写见闻录颇为看重，这位时年18岁的年轻藩士说：

> 如果把此次同船的几十个人的各自见闻汇集起来集大成的话，肯定会有不少有益的东西，只叹我力不从心。[37]

这实在是甚有史学眼光的设想。

翻阅上述见闻录，少有风花雪月的咏叹，多有对上海社会实态的记述与思考，从中可以看见年轻的下层武士们（年龄最小的纳富18岁，较大的中牟田25岁、五代27岁，居中的高杉、日比野23岁左右）席不暇暖、左右采获的身影，显示了近代日本人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趋向和富国强兵的炽烈追求。这批怀着旺盛求知欲和深沉忧患感的藩士，后来多投身幕末维新和明治维新，有的还成为挽狂澜、创新机的著名历史人物，如“幕末维新狂飚”高杉晋作和明治维新著名政商五代才助（友厚）。

江户幕府延至19世纪50年代的锁国令，严禁日本人出境，直至开国初期，日本人也不能自由出境，1854年吉田松阴因密谋偷乘美国军舰出海而入狱，支持其行为的教师佐久间象山也遭逮捕，1862年方被赦。故幕末日本人能得一出海机会实属不易，1862年幕府的第一次上海遣使吸引了高杉、中牟田、五代等蛰伏草野的英俊之士，便毫不奇怪。而这些胸怀大志的青年武士确也不虚此行，他们以今之阿倍仲麻吕（朝衡）、吉备真备自命，于二百年锁国之后，首航清国，将一千多年前遣唐使

的辉煌业绩向前推进。上海两月，藩士们踏查访问密锣紧鼓，显示出强烈的好学精神和沉郁的思索风格。而处在古今中西交汇点的上海，提供了斑烂多彩的社会转型情景、纷至沓来的东西方信息，大大充实了他们饥渴的心灵。藩士们奋笔记录目睹身受，留下数量浩繁的纪行文字，活现出同治初年华洋杂处的上海的历史场面，并展示了日本幕末志士“以清为鉴”，寻求开国、维新之路的心迹。

---

①《浙江通志》卷95，《海防一》。

②中村新太郎：《日本与中国的二千年》下，东邦出版社，昭和48年1月版，第390—391页。

③见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斋藤文话》。

④日本人在17世纪初已数次横渡太平洋，并曾航行于印度洋、大西洋。至于东亚海域，日本人已有数千年航行历史。

⑤黄遵宪：《日本国志》卷6。

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第47页。

⑦《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8页。

⑧目付：室町至江户时代的武家官职，为幕府负责监察、侦探的官员。

⑨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和1860年先后从中国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1年日本“亀田丸”驶航黑龙江河口，此地刚成为俄国领土不久。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名“庙街”，在黑龙江下游左岸，东距河口80公里，原属中国，1850年俄国入侵，在此设军事哨所，1856年建市，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被俄割占，改今名。

⑩参见《匪夷入港录》第1卷，第287—300页。

⑪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18页。

⑫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94页。

⑬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

⑭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19页。

⑮有关“千岁丸”概况，见胜海舟《海军历史》卷二十三，船谱。又见“千岁丸”乘员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二篇分别收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尤玛尼书房，平成九年版，共20卷，以下简称《集成》第1卷、第11卷。

⑯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集成》，第11卷，第91页。

⑰高杉晋作：《游清五录·航海日录》。

⑱《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3页。

⑲《匪夷入港录》，第一卷，第308页。

⑳见汤志钩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㉑1862年9月14日，一批护送藩主的萨摩藩士路过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迎面与几个英国人相遇，互不让路，萨摩藩士拔刀袭击英国人，杀死英商理查多松，刺伤三人。史称“生麦事件”。

㉒英人十四名，见中村孝也：《子爵中牟田仓之助传》。

㉓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载：“此外还有十五个英国人、一个荷兰人乘坐该船。英国人是船的卖主，荷兰人以货主之名雇来的。”(《集成》第1卷，第12页)高杉晋作《游清五录·航海日录》称“千岁丸”，“亦英船，船将（船长——引者）英商亨利·里查多松，其余英人十四名乘船，皆关运用之事。”

㉔御勘定：全称“御勘定吟味役”，幕府老中直属，为勘定奉行下辖的重要官员，俸禄五百石。

㉕调役并：审查官。

㉖支配勘定：御勘定下属官吏。

㉗御徒士目付：御目付相当于中国明朝的按察司，御徒士目付相当于中级按察官员。

㉘御小人目付：低级按察官员。

㉙㉚见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

㉛《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20页。

㉜高杉晋作：《游清五录·航海日录》写道，1862年5月25日（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高杉登上“千岁丸”，发现“有一人，闻其言语，殆如旧知己，熟看之，乃浪速处士伊藤军八也。军八颇有文事，予尝于昌平塾同学一年，不计再逢于此地，况同船同行，俱称，实可谓奇遇也。”

㉝见名仓予何人：《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等。

㉞《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

㉟见松田屋伴吉：《唐国渡海日记》，《集成》第11卷。

㊱见沼田次郎、松泽弘阳编：《日本思想大系·西洋见闻集》，岩波书店，1978年版。

㊲《集成》第1卷，第21页。